

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八个哲学家



●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

●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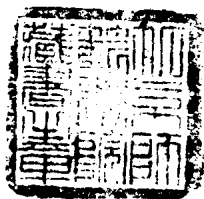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八个哲学家

〔美〕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著

姚 鹏 陶建平 译

孟庆时 校

DB45-53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39894

Paul Oskar Kristeller

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

【美】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 著

姚 鹏 陶建平 译

孟庆时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29,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书号: 2188·36 定价: 1.20元

译者的话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是一部学术专著，作者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研究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学者。除本书之外，他的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费奇诺的哲学》（1943年）；《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哲学》（1948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第1卷，1961年；第2卷，1965年）；《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中世纪传统》（1966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第1卷，1974年；第2卷，1975年），此外，他还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

本书第一版于1964年问世，从1970年至1979年，每年重版，影响颇大。正文共八章，分别介绍了彼特拉克、瓦拉、费奇诺、皮科、彭波那齐、特勒肖、帕特里齐、布鲁诺的生平和主要哲学思想，正文后还有一篇附录，介绍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思想的中世纪前提。

本书介绍的八个哲学家可归入四个流派：（一）人文主义：彼特拉克和瓦拉。作者认为，人文主义者在哲学上有两大贡献，第一，他们发掘了古代文献，使中世纪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此引起一系列古代流派的复兴；第二，他们减弱了哲学的宗教色彩，使其世俗性日益浓厚。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正文和附录中都探讨了人文主

义和人道主义的渊源和本来含义，这对我们今天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混乱很有裨益。

(二)柏拉图主义：费奇诺和皮科。作者认为，费奇诺的柏拉图学园标志了柏拉图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固然宗师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但它与人文主义者结成密切的联盟。中世纪后期，在基督教正统思想中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因此，柏拉图主义的复活是对经院哲学的离经叛道。

(三)亚里士多德主义：彭波那齐。作者强调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不同，前者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本来面目，使哲学与神学分开，但是仍未达到纯粹自然主义或反宗教的观点。

(四)自然哲学：特勒肖、帕特里齐和布鲁诺。自然哲学是与科学进步同时发展起来的，它的代表人物是新体系的创立者，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先驱。他们与人文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关系密切，都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

这本书史料丰富翔实，引据了许多我国学者难以见到的第一手材料，甚至包括一些手稿，因此，它对我国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研究会有较大的帮助。这本书由九篇独立的论文组成，但是作者力图把这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联系起来考察，追溯了他们的思想渊源，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指出他们对后来哲学家的影响。作者没有笼统地评价任何哲学家，而是具体地分析每一哲学体系在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承认其相对价值和相对真理权。作者在论述皮科时，肯定了皮科关于每一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分

享一份普遍真理的见解,并把这种见解用于自己的评论中。

这本书也是有缺点的。首先,它结构比较松散,未能一气呵成。其次,作者由于考虑到人们对彼特拉克和布鲁诺比较熟悉,所以把他们写得比较简单,但我国读者对他们的哲学却了解得并不多。

作者开宗明义已经指出写作本书的目的,把它作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补充。他认为,布克哈特只注意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历史等,忽视了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而后者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们不仅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为近代哲学的发展铺平道路,而且他们自己也提出了许多具有近代气息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本书虽然仅仅介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的思想,但这些思想足以反映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全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给予很高评价,而我国对这一时期的哲学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的环节,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材料。为此,我们把这部著作全文翻译出来,并补充《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一书德文版所附的“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的著作书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我们在翻译本书过程中得到葛力教授的许多指教,孟庆时老师在百忙中校阅了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姚 鹏 陶建平

序 言

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以我1961年5月在斯坦福大学所做阿伦斯堡演讲为基础，这些演讲是由弗兰西斯·培根基金会赞助的。这几篇演讲的目的是要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作一个概观，它们至少部分地包括了我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给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讲课时多次论述的同一课题。整个关于文艺复兴哲学的课题对于用一个学期来做个得体的论述也显然是太大了，更不用说一次系列讲演了。所以，只好搞成一本薄薄的选论。这样，它免不了是武断的，并且受我的知识和兴趣的限制。为缓和这些不足，我只好说，我选择的这些思想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我尽可能准确地提供关于他们的材料。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也必须对这本书分担责任，因为正是他们友好地促使我来作这些讲演，并把它们出版。不过，为了为我的努力作辩护，我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本书提供的仅仅是对一个有价值的主题的论述，但论述这一主题的英语著作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对一些不太好的书常常是作这样的评价的。

第九篇演讲不属于这一系列，而是在其他场合做的，它被作为附录补充于后。它的内容比较一般化，也许可以当作一篇导论。但因它与主要系列重迭，并且仅涉及人文主

义，而未涉及整个文艺复兴的思想，我还是乐于把它当作附录。我在康奈尔大学、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都曾做过这个演讲，它同我已经出版的一些论文密切相关，因而在本书中对这个演讲没有注释。

在准备出版这些讲演的过程中，我彻底地修改了它们的风格，而一般内容则几乎保持原样。根据从斯坦福出版社和它的读者那里接受的有价值的建议，我补充了一些注释和一个参考书目。显然我不可能对这种性质的书提出一个完备的文献证明，但我至少是尽力地指明了我的说明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来源，而且我乐于鼓励读者，尤其是学生去就这一课题作进一步的广泛阅读。凡是从本书所讨论的作者那里引用的话，大部分是我自己翻译的，但在注释中均指明原著版本和最容易得到的英译本。有些地方，我在注释中引用了拉丁文或意大利文原著，因为我认为译文仅仅是不完善的代用品，总是希望强调要把握原著在含意上的细微差异，把握它的术语和措词。各章注释所用方法不同。在引用特勒肖、帕特里齐这样一些以清楚连贯的方式论述自己的题目的作者的原话时，我常常就简单地指出原文本身的章节，在脚注上不提供精确的出处。而对那些思想零散没有系统发挥的作者，就须精确地注出具体的段落或句子。在费奇诺的那一章中，我大胆提到了我论述他的著作。在那部著作中，对他的观点的讨论以及有关的文献证明，都比本书做得更加充分。我关于布鲁诺的清楚注释只限于他的主要的意大利文对话。

虽然，我的许多评论批评了其他学者的观点，至少是含蓄的批评，但是在本书中我还是力图避免争论。也许我应该为大量的附带性的说法表示歉意，这些说法在当时是有助于使这些演讲活泼、有生气的，人们也鼓励我出版时保留这些内容。

我要感谢我的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他们对此书的出版颇感兴趣并积极赞助，尤其应感谢约翰·戈亨教授、理查德·琼斯教授、约翰·莫特亚德教授、劳伦斯·赖安教授、帕特里克·萨普斯教授以及维吉尔·怀特克教授。我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对J.G.贝尔先生和波琳·威克汉小姐的建议和关心深表感激。查尔斯·B.施米特教授和查尔斯·特兰考斯教授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的参考书使我受惠不浅。我也受惠于哥伦比亚大学小约翰·H.兰德尔和哈佛大学图书馆W.H.邦德先生，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使我能够得到为完成本书所必不可少的一些书。

保·奥·克利斯特勒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1964年1月4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彼特拉克.....	1
第二章 瓦 拉.....	24
第三章 费 奇 诺.....	46
第四章 皮 科.....	66
第五章 彭波那齐.....	89
第六章 特 勒 肖.....	112
第七章 帕特里齐.....	134
第八章 布 鲁 诺.....	157
附 录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中世纪前提.....	180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的著作书目.....	200

第一章 彼特拉克

自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著名论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发表到1960年，已经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在1960年，我们是在庆祝开创文艺复兴研究的一百周年。回顾百年来这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和解释，同时，也可以看到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引人注目地积累起来了，当然这些工作还远未完成。布克哈特所描绘的图景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他的著作尚未被内容同样广泛的综合性著作所取代，而且，现在许多学者都承认，虽然布克哈特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显然需要纠正和补充，但是他的观点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有效的。

布克哈特留给他的后继者的大量问题之一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位问题（我们想把这一时期粗略地限定在十四世纪初至十六世纪末）。有鉴于布克哈特把他的研究局限于意大利，那些对该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贡献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就不得不来确定这样的问题：这些贡献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功于本国的发展？或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功于意大利的影响？布克哈特关于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居于无可匹敌的重要地位的基本主张几乎是没有疑义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也由于我的知识的局限性，可以说，我把我的这

些演讲局限于几位意大利思想家的这个决定也许是正确的——虽然人们很容易在其他国家找出一些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

在文艺复兴研究的更为广泛的领域中，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一直是人们比较忽视的方面。研究这个时期的一般学者，包括布克哈特本人在内，都倾向于注意这一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的历史，或者注重这一时期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以及对古典作品的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较少注意这一时期的哲学。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在研究哲学史时，因循传统，把目光集中在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上，只是最近才开始注意中世纪的思想。非奥朗提诺(Fiorentino)、狄尔泰(Dilthey)、卡西尔(Cassirer)、金蒂利(Gentile)、加兰(Garin)、纳蒂(Nardi)，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还没有被充分地吸收到普通哲学史教科书或哲学史课程中去。进一步说，这些学者本身也远没有对这一课题作详尽无遗的研究。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难于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文献并没有提供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儿那样一些其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大哲学家的名字。此外，哲学的涵义、哲学与其他门类的知识的关系也都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同，倘若我们完全按照一些现代思想学派(不论是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还是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来解释哲学的内容和任务的话，那么都会使本来构成哲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过去思想的广大领域变得与哲学史无关了。另一方面，一个想要从所有的表现形式上来

理解一个时期的风格上的统一性的文化史家，也许会对该时期的职业哲学家产生不耐烦，因为这些哲学家使用的某些术语、关心的某些专门问题，似乎使他们与其他时代的哲学同事的联系比与他们那个时代的舆论的联系更为密切。

虽然有这些困难，我相信，无论是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还是研究哲学及其历史的学者，对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兴趣，都将持续下去，甚至还会增强。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为理解该时期的艺术、文学、宗教和科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根据，并有助于哲学史家理解那些诸如使培根、笛卡儿与阿奎那、奥卡姆区分开来的观点的不同之处。为了讨论这个时期几个较为重要的思想家，我涉及的仅仅是广阔而复杂的领域的一隅，这个广阔而复杂的领域包括大量补充性的和部分地尚未被涉猎过的领域。

在这一时期，对哲学思想史发生影响最早和最普遍的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近年来，人们对这个运动的意义有过许多争论和误解。假如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个运动，首先就必须设法忘掉那种强调人的价值的相当含糊不清的次要意义。人的价值这个术语是人文主义从现代的语言中获得的。而且，为了把握人文主义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义，我发现从人文主义这个术语（它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提出来的）回溯到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个术语是很有帮助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个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

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和发展；人文主义对其他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

此外，我认为用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具有的一套特定的哲学思想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下定义是不可能的，或者也不能完全把人文主义看成一个哲学运动，更不用说象最近许多学者已经试图做的那样，认为人文主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哲学。人文主义者的大部分著作，不是哲学的（即使从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而是博学的或者说是文学的。许多身为著名学者或作家的人文主义者甚至对伦理学这样的哲学的分支也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贡献，而伦理学是被看作他们研究范围的一部分的。另一方面，在他们研究领域以外的哲学学科，如逻辑、形而上学或自然哲学，曾对之作出直接贡献的人文主义者，比较起来就微乎其微了，而那些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了主要工作的思想家们，尽管时常深受人文主义者的影响，就是说接受了古典的和文学的训练，但是也不能简单地给他们贴上人文主义者的标签，归到人文主义者的行列中去。最后，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的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他们的共同特征则表现在一种在教育、学问和文体方面的理想上，表现在他们研究的问题和兴趣范围上，而不是表现在他们

忠于任何一套特定的哲学或神学的观点上。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作出正确评价，那就应该认识到他们是学者和作家，也是思想家，他们对哲学所作的贡献——这必然是我们作为哲学史家的主要关注点——一定夹杂有其他的非哲学的成见或影响。我认为，一个哲学家同时还从事其他智力方面的研究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或科学家这种现象更习惯一些。不过，我们必须记住，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的业余兴趣是博学和文学，而不是神学和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情况正是如此。

因此，除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奉献给哲学史的特定的哲学思想以外，我们还可以对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所给予哲学史的强有力的间接影响作一评价。如果现代哲学家一直能写出许多文章、讲演稿、论文和论著，而不是提问题，作评论，那么他们就是不知不觉地在现时代坚持了发端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如果他们不仅能读到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和阿奎那的著作，而又能读到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以及柏拉图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原著或译本，那么他们正是受惠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丰富这些哲学书籍所做的大量工作。

我们将选择几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评述。彼特拉克就是我们所要评述的第一个人，他通常被人们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创始人，但我宁愿把他称为这个时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可能

是对该时代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年生于阿雷佐(Arezzo)的一个被流放的佛罗伦萨人的家庭,八岁那年被带到阿维尼翁。在蒙培利埃(Montpellier)和波洛尼亚(Bologna)城学习法律之后,从1326至1353年他是在阿维尼翁度过的。当时阿维尼翁是教皇教庭的所在地。在这时期,他多次长途旅行到意大利。1353年移居意大利,主要居住在米兰、威尼斯和帕多瓦,他在自己的祖国度过了余生。1374年他死于帕多瓦附近的阿尔卡(Arquà)。他曾担任过有薪俸收入的基督教牧师的职务,他还受到科伦纳家族和维斯康提家族的庇护,据说他曾经给这两个家族当过秘书。

在现代,彼特拉克的声誉主要来自他的意大利文的诗歌,这些诗篇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然而,对彼特拉克本人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讲,同样地,对直到十六世纪的以后几代人来讲,他的大量的拉丁文作品象他的意大利文诗歌一样重要。这些拉丁文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多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这些作品包括拉丁文诗歌、演说稿、论战文章、少量历史著作和大量书信,这些书信象他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由彼特拉克细心地保存、收集并编辑的。

他的最后一批著作属于道德哲学,所以直接与本文有关。其中包括这样一些著作:1366年写的对话集《论好和坏的命运的补救法》;1358年以前完成的论文《论我的焦虑的秘密冲突》,即著名的《秘密》;1356年写的《论隐士生活》和1367年写的《论他自己的和许多其他人的无知》。

我们必须从这些没有条理的、系统性不强的作品和他的书信中，寻找彼特拉克的哲学观点。他的许多思想是一些倾向和愿望，而不是成熟的观点和学说。这些不成熟的思想是与他的广学博识、他的情趣和感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思想仍然是重要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彼特拉克自身的缘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数代人文主义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彼特拉克的思想从来不是以系统的方法阐述的，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从许多散见的论述中，把他的思想重新勾划出来。

彼特拉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经院主义（即中世纪后期的大学中的那种学究式的研究）所抱的敌视态度。这一方面为后来直到斐微斯(Vives)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发展。他攻击占星术，同样也攻击逻辑学和法学，并把自己的全部著作都用于批判医生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虽然这些攻击实际上无所不及并富有启发性，但却远没有深入他所攻击的那些学科的专门问题和方法；这些攻击带有强烈的个人和主观的色彩，并且反映了彼特拉克与这些领域的代表人物之间的个人冲突和敌对，而不是在一些具体问题或论点上的差异。彼特拉克反对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注释家阿威罗伊的权威，但他这样做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并非基于客观的理由。当他批判了关于世界永恒、在现世生活中可臻完满幸福以及所谓双重真理说时（即当时许多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所主张的关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都各自有效的理论）。他的主要论据是这些理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矛盾。